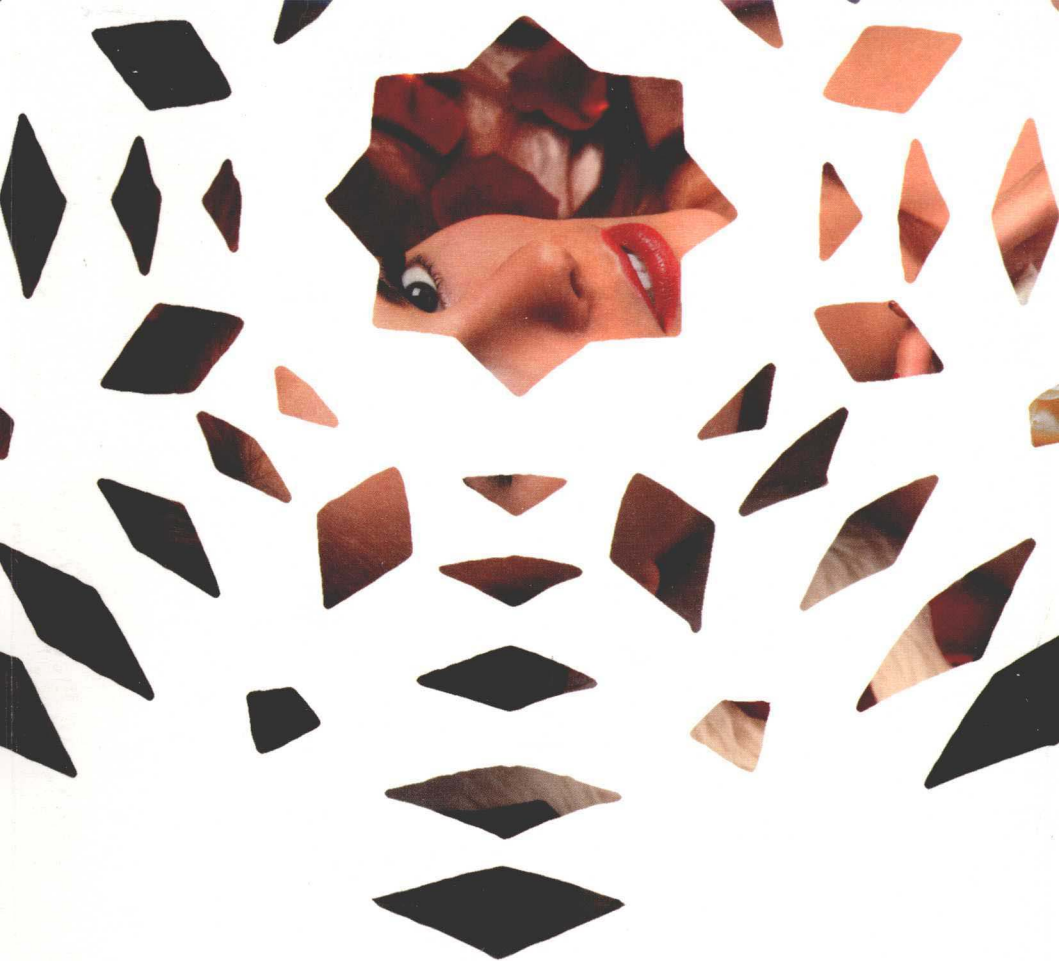




SNOWDROPS

A.D.MILLER

雪融之后

[英] A.D.米勒 著 林立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SNOWDRC _ _

A.D.MILLER

雪融之后

[英] A.D.米勒 著 林立仁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3-1193

A. D. Miller

SNOWDROPS

Copyright © Andrew Miller 201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文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融之后/(英)米勒著;林立仁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722-7

I. ①雪… II. ①米…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7451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仲召明

责任编辑:温哲仙

封面设计:李 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9 千字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722-7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雪花莲 (Snowdrop)

- 春天最早开花的球根花卉，花白色，呈下垂状。
- 莫斯科俚语，意指为冬雪埋藏的尸体，冰雪融化后才会浮现。

献给阿尔卡基、贝姬、盖伊、马克，特别是艾玛

还没看见,我就闻到了。

人行道和马路上围着一群人,有的讲手机,有的抽烟,有的正在查看,有的望向别处。大多数是警察。我走来的那个方向,视线正好被他们挡住。起初我心想,街上聚集这么多制服警察,一定是发生了车祸,再不然就是有非法移民遭到逮捕。接着,我闻到了那股气味。就像你出门度假前忘了丢垃圾,回家时扑鼻而来的酸臭气味。味道之强,足以盖过夏日正常的气味,像是啤酒和革命的气味。那股气味太明目张胆了。

来到距离人群大约十米之处,我看见一只脚。只有一只,仿佛脚的主人正缓缓踏出豪华礼车。至今那只脚仍会浮现我眼前。那只脚穿着廉价懒人鞋,鞋的上方是拉长的灰色袜子,再上方可瞥见发青的皮肤。

他们告诉我,严寒的天气把尸体保存了下来,但不知道尸体躺在那里多久了。也许躺了一整个冬天,一名警察如此推测。凶器是镭头,也可能是砖头,手法并不很利落,那警察说。他问我要不要看看尸体的其他部分。我说不用,谢谢。那年冬天我的所见所闻已超过我需要知道的。

你总是说,我从来不提我在莫斯科的那段日子,也不说我为何离开。你说得对,我总是找理由搪塞。很快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但你

只是不停追问。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回忆老是会浮现,无法阻挡。也许因为距离我们的“大喜之日”只剩下三个月吧,不知为何这似乎成了一种惩罚。我觉得我需要找个人说说俄国发生的事,即使会觉得痛也无所谓。并且,你也需要知道这些事,毕竟我们即将对彼此许下承诺,信守不渝。我想你有权利知道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用写的可能容易一些,你不必费力做出坚强的表情,我也不必看那种表情。

所以,我全写在这里了。你想知道我的莫斯科生涯是怎么结束的,这个嘛,那天下午看见那只脚时,就差不多结束了。但那段生涯的结束其实始于一年前,九月的地铁站。顺带一提,当我把那只脚的事告诉斯蒂夫·沃尔什时,他说:“雪花莲。你那个朋友是雪花莲。”他对我说,冰雪融化而浮出雪面的尸体,俄国人称之为雪花莲。这类死者多半是酒鬼和流浪者,自我放弃而倒在皑皑白雪中,有些则是被凶手藏在积雪之中的被害者。

雪花莲:腐恶已然存在,一直存在且极为靠近,但你总能视而不见。寒冬掩藏的罪恶,有时永远不被人知晓。

1.

至少我能确定她的名字。她名叫玛莉亚·科瓦连柯，朋友叫她玛莎。我头一次见到她，她站在革命广场地铁站的月台上。我看了她的脸庞大约五秒后，她拿出小化妆镜举到面前，另一只手拿了一副太阳眼镜戴上。那时我心想，那副太阳眼镜可能是她刚刚在地下道某个小摊贩那里买来的。她倚着月台最后面的一根柱子，那里的公民雕像有运动员、工程师、胸部丰满的农场女工和手里抱着健壮宝宝的母亲。我看了她好一会儿。

在革命广场站搭乘绿线地铁会产生片刻错觉，仿佛那些雕像也要一起登上地铁车厢。旅客上车时需经过跨越地铁轨道的架高小走道，一侧可以看见一排碟状吊灯沿着月台延伸而去，隐没在列车出现的黑暗之中，另一侧可以看见往同样方向行进的旅客，只不过他们是在另一个不远处的平行小走道。那天我往右侧看去，便看见那个戴太阳眼镜的女子正往相同方向前进。

我搭上地铁，站在黄色嵌板和旧式长条形日光灯下，准备前往下一站，普希金广场站。每回搭乘地铁，这种车厢都让我觉得自己像七

十年代唐纳德·萨瑟兰^①主演的某部偏执电影中的临时演员。到了普希金广场站，我乘电动扶梯上楼，上方有状似阳具的吊灯，然后一如往常，我替后面的乘客拉开地铁出口的厚重玻璃门，接着走进普希金广场下方宛如迷宫、地势低矮的地下道。此时，她发出尖叫。

她就在我后方约五米处，一边尖叫，一边跟后脑扎着马尾的干瘦男子搏斗，因为男子想抢走她的手提包（一只招摇虚华的仿博柏利^②手提包）。她高声呼救，而身旁的女性友人也只是高声尖叫。后来我得知她的朋友名叫卡佳。起先我只站在一旁观看，但男子扬起拳头，仿佛就要往她身上挥去，我听见后方有人发出吼声，像要出手制止。这时我往前几步，拉住干瘦男子的领子往后拖。

男子放开手提包，曲起双肘向我顶来，但并未顶到。我手一松放开了他，他一时重心不稳，跌倒在地。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来不及仔细打量他的长相。他年纪颇轻，约矮我四英寸，满脸羞愧。他踢出一脚，不痛不痒地踢到了我的小腿，然后仓皇地爬起，跑出地下道，爬上远处一道阶梯。阶梯通往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大街斜坡从普希金广场向下延伸至红场。这条街相当于伦敦最繁华的牛津街，只不过停车乱无章法。特维尔大街的阶梯底端附近有两个警察，但他们正忙着抽烟，寻找可以骚扰的移民人士，并未注意那个抢匪。

“谢谢。”玛莎说。她摘下太阳眼镜。

① 唐纳德·萨瑟兰（1935— ），加拿大著名演技派男影星，多饰演动作片人物、怪人，或亦正亦邪的角色。

② 始创于一八五六年的英国著名时尚品牌。

她身穿紧得不能再紧的牛仔裤,裤管塞进褐色及膝皮靴之中,白色短衫多开了一颗扣子。短衫外是一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滑稽秋季外套,贫穷的俄国女子时常会穿的衣服。如果仔细看这种外套,会发现它们似乎是用地毯或海滩浴巾制成,再加上猫毛做成的领子。远远看去,穿这种外套的女子像是冷战时期惊悚电影中作为美人计的美女。她的鼻子又直又挺,肤色苍白,留着褐色长发。倘若她运气好一点,可能会是那种坐在价格昂贵、天花板贴满金箔的高级餐厅里(像是公爵府或狩猎屋)用餐的女人,嘴里嚼着黑鱼子酱,脸上对着商业巨子或人脉丰沛的石油富商露出娇纵的微笑。也许她正是这种女人,只是我不确定。

“谢谢。”她朋友说,紧紧握住我右手手指。她的手又暖又轻。我揣测那戴太阳眼镜的女子大约二十出头(也许二十三),她朋友看起来更年轻,可能只有十九岁或更小。她朋友穿着白靴、粉红色假皮革迷你裙和一件相衬的夹克,鼻子娇小尖翘,金色直发,脸上露出率真迷人的俄国女孩式笑容,直视着我。这种笑容就像我们曾在意大利里米尼海岸小村教堂里见过的婴儿耶稣的笑容,你还记得那个婴儿耶稣像吗?婴儿耶稣的稚嫩脸庞露出智慧苍老的微笑,仿佛在说: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要什么,我生来就知晓万事。

“举手之劳。”我说。又用俄语补上一句:“你没事吧?”

“没什么事。”戴太阳眼镜的女子说。

“太好了。”我说。

我们对彼此微笑。我的眼镜因地铁里终年不散的烦腻热气而

浮起一层白雾。地下道一个 CD 小贩正在播放民谣乐曲,歌词从酒醉的俄国歌手喉里迸发出来,听起来仿佛他打从在娘胎里就是个烟枪。

在另一个平行时空、另一场人生中,故事到此为止。那天下午我们互道再见,我转身回家,第二天继续当我的律师。也许在那一场人生中,我现在仍在莫斯科,说不定我换了份工作留下来,不曾回国,也不曾遇见你。那两个年轻女子继续过她们的生活,遇上另一个人,而有些事会发生在那个人身上而不是我身上。但我被那种冒险成功的感觉以及做了好事的兴奋给冲昏了头。我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地方做出了高尚的行为,是个无足轻重的英雄,她们将我视为英雄,而我心存感激。

那个较年轻的女子一直把微笑挂在脸上,较年长的女子只是睁眼看着。她比她的朋友高,身高可能有五英尺九英寸或十英寸,她的身高加上鞋跟的高度,使得那一双绿色眼眸正好对上我的双眼。那对绿眼眸十分迷人。总有人得说些话,于是她用英文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说:“我从伦敦来的。”我不是伦敦人,你知道的,但我的老家离伦敦很近。我用俄语问说:“你呢?”

“我们住在莫斯科。”她说。当时我对这种语言游戏已习以为常。俄国女人总是说她们想练习说英语,但有时她们也希望让你觉得你握有主导权,在她们的国家可以安全地使用自己的母语。

又一个只有微笑的沉默片刻。

“所以,谢谢你。”她朋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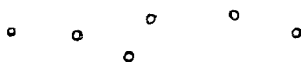
三个人都没移动。玛莎说：“你要去哪里？”

“我要回家，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只是在散步。”

“那我们散散步。”我说。

于是我们散步。



九月中旬，俄国人称这段时间为“老奶奶的夏天”，天鹅绒般的暖意苦苦甜甜地舔上你的肌肤。这种温暖天气通常在农妇收割庄稼之后来到；如今在莫斯科，“老奶奶的夏天”意味着能在广场和街心花园路上露天喝酒的最后时节。（街心花园路是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条美丽的老街道，巷弄间有绵延的公园，里头有草地、长椅、知名作家和被遗忘的革命者的雕像）。现在是去那里最好的时节，但我们可能不会去吧。地铁站外的摊贩摆出假皮毛中国手套，准备迎接冬季；红场上的观光客仍排成长长的队伍，要参观怪诞的列宁墓。午后甚是炎热，城市里有半数女人仍穿得十分清凉。

我们从广场下方的地下道爬上狭窄阶梯，来到外头的亚美尼亚超级市场，接着穿过严重拥塞的车流，踏上街心花园路的宽敞人行道。天空除了飘着一朵云，便只见一缕烟雾从工厂或市区电厂冉冉冒出，在傍晚的蓝色天际格外清楚，十分美丽。空气中闻得到廉价汽油、烤肉以及性欲的气味。

“你在莫斯科做什么工作？可以说吗？”大一点的女子用英语问。

“我是律师。”我用俄语回答。

她们快速地低声交谈了几句话,我听不懂。

“你来莫斯科几年了?”年轻女子问。

“四年,将近四年。”我说。

“你喜欢吗?”年长的太阳眼镜女子说。“你喜欢莫斯科吗?”

我说我很喜欢莫斯科,心想她应该会喜欢听见这个答案。我发现,即使是一心想离开莫斯科前往洛杉矶或蔚蓝海岸的俄国人,潜意识里都有一股民族自尊心。

“你做什么工作?”我用俄语问她。

“我在一家店里工作,卖手机的。”

“这家店在哪里?”

“河的对岸,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附近。”她说。她默默地走了几步,又说:“你的俄语说得很好。”

她过奖了,不过我的俄语确实比莫斯科大部分的投机银行家和江湖郎中一般的医学顾问要好。这些人由表面光鲜的英国人、嘴上强硬的美国人和明欺暗骗的北欧人所组成,为了追赶黑金热潮而来到莫斯科,多半只往来于办公室、有警卫的公寓、以公款付账的妓院、高级餐馆和机场之间,会说的俄语词汇只有二十几个。我说的俄语近乎流畅,只不过第一个音节还没说完,口音就泄了底。玛莎和卡佳一定在我开口说话之前,就看出我是外国人。我想,我应该很容易被从外貌看出来。那天是周日,我去了一个孤身一人会计师家里参加一场怪异的外国人聚会,正要回家。我穿了一件颇新的牛仔裤和麂皮靴子,深色V领毛衣,里头是马莎百货的衬衫,莫斯科人通常不会

这样穿。莫斯科有钱人会穿印有电影明星的 T 恤和意大利皮鞋，没钱的大多数人则穿军队剩余物资走私品或廉价的白俄罗斯靴子和颜色暗淡的裤子。

玛莎的英语发音甚为标准，只不过文法有点杂乱。有些俄国女人说英语会把嗓音拉高，像在发表过度激昂的演说。玛莎说英语时反而降低音调，几乎像在咆哮，碰到 R 便饥渴地卷舌，仿佛狂欢了一整夜或经历了一场战争。

我们往啤酒棚的方向走去。啤酒棚通常在五月的第一个温暖夏日搭起来，整个城市仿佛都移到了街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到了十月，老奶奶的夏天结束后，啤酒棚便会收起来。

“请告诉我，我朋友跟我说英国有两个……”年轻女子说。

她停顿下来，跟年长女子用俄语交谈。我听见“热”、“冷”、“水”这些字。

“那叫什么？水出来的地方，在浴室里？”年长女子问。

“水龙头。”

“对，水龙头，”年轻女子继续说，“我朋友说英国有两个水龙头，所以热水有时会烫到她的手。”

“对，是这样。”我说。我们走在街心花园路的人行道上，附近有一些跷跷板和摇晃的溜滑梯，还有个胖老妇正在兜售苹果。

“伦敦常常起大雾？是真的吗？”她又问。

“不是真的。一百年前才会，现在不会了。”我说。

年轻女子垂眼望向地面，戴太阳眼镜的玛莎露出微笑。我经常回想，那天下午我究竟看上她什么地方了？我想，我除了喜欢她那瞪

羚般细长结实的身體、她的聲音、她的眼眸外，便是她那諷刺的神態，那種神態彷彿在說她已經知道事情會如何結束，而且希望我也知道。也許這只是後見之明，但我觉得她那時已經在向我道歉了。對她來說，人與其行為是分隔開的，你可以埋葬你做過的事，拋諸腦後，仿佛你的過往屬於另一個人。

我們來到街心花園路和我住的那條街的交叉路口。遇見你之前，我習慣有美女相伴。我緊張而輕率，像在演戲，過着別人的生活，而且必須尽可能享受這樣的生活。

我比個手勢說：“我住那里。”然後我聽見自己說：“你們想不想上去喝杯茶？”

我知道，你一定會認為說這種話太可笑了，竟然使出這種招數。但是在幾年前，在莫斯科的外國人還很神秘，律師賺的薪水也會贏來一個肯定的回復。這招可能奏效，這招曾經奏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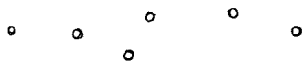
然而，她說“不”。

“不過，你可以打電話給我們。”她說。她望向年輕女子，年輕女子從左胸口袋拿出一支筆，在無軌電車車票背面寫下電話號碼，遞給我。

“我叫瑪莎。她叫卡佳，是我妹妹。”她說。

“我叫尼克。”

身穿粉紅色迷你裙的卡佳倚在我身上，吻了吻我的面頰。她對我露出另一種微笑，亞洲式的微笑，不帶任何含意。她們繼續沿着街心花園路走，我看了她們好一会儿。



街心花园路上到处都是豪饮、嗜睡和接吻的人，帮派分子和青少年聚在蹲着的吉他手身旁。天气依然温热，我住的那条街上，街角一家餐馆的窗户全都敞开，让夏天经常聚集于此的高人气妓女和一般妓女透透气。餐馆周围的人行道上停满乏味的黑色奔驰和悍马越野车，我得走上马路才能绕过这些车。我转个弯，踏上我住的那条街，沿着芥末色教堂的旁边往我的公寓走去。

我猜这应该是另一天了，也许是因为眼前事物似乎属于地铁站初遇的那一天，所以我把这些回忆记成了发生在同一天。但印象中，我首次看见那辆俄制“日古利”^①轿车是在同一天的晚上。那辆日古利停在我的公寓那一边的马路上，前后停了两辆宝马，它被夹在中间，仿佛一缕来自昔日俄国的幽魂，或是一道“找出不同”游戏的简单答案。日古利的外形有如儿童画笔下的汽车：轮胎上叠个箱子，箱子上再叠个箱子，然后画上一个火柴棍司机和方向盘，外加滑稽的圆形车头灯。如果儿童作画兴致高昂，还会再加上圆圆的瞳孔，让车头灯更像眼睛。日古利是大部分莫斯科男人花大半辈子时间等待购买的车，他们或许会告诉你说他们打算买一辆日古利，目前正在存钱，而且排上了购车等候名单。柏林墙倒掉之后，俄国人在电视上看见了美国现况，他们人脉较佳的同胞买了进口新款轿车，这才发现原来他

① 即经典款拉达，在苏联时期曾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们连梦想都很寒酸。虽然我不太确定,但眼前这辆日古利原本可能是暗橘色的。车子侧边沾满泥土和油污,像坦克车上过战场后的样子,车身晦暗。如果你对自己全然坦白,便会知道在莫斯科待了几年之后,你的内心也会变得如此晦暗,也许连灵魂也晦暗了。

通往我住的那栋公寓的人行道年久失修,逐渐和马路融为一体,如同绝大多数的俄国人行道。我经过教堂庭院和那辆日古利来到公寓门口,在对讲机上键入密码,开门进入。

我住在莫斯科一个公寓街区,这一区的公寓建得富丽堂皇,是命数已尽的富裕商人在革命前建造的。这栋公寓就跟莫斯科市一样,经过时间摧残,像由几个不同的建筑物拼拼凑凑而成。丑陋的电梯是后来加装的,顶楼则加盖了第五层楼,但公寓里面仍保有原本的螺旋状铁制楼梯。公寓里每一户的大门几乎都由可防斧头砍劈的钢铁材质制成,表面包覆一种皮革衬垫作为装饰,这种风格让人觉得整个莫斯科高级住宅区是个安全欠佳的避难所。来到三楼,我闻到猫沙的气味,听见邻居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家中传出俄国交响曲那让人精神崩溃的尖锐乐音。来到四楼,我在皮革衬垫门的门锁上用钥匙转了三圈,推门而入。我走进厨房,在餐桌前坐下,从皮夹里拿出上面写了玛莎电话的电车车票。

过去在英国,在认识你之前,我只和一个女人发展出你可能会严肃地称之为“亲密关系”的关系,我想你应该认识那个女人。她就是娜塔莉。我们在大学里认识,但在参加某人在肖尔迪奇区举办的生日派对,大家都喝得烂醉之前,我们从未把彼此视为可能的交往对象。我想我们开始发展关系之后,两个人都没有能力结束它。六七